

高校如何更好推进“第二个结合”

□ 任友群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高校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力量,要坚持和推进“第二个结合”研究阐释,勇于担当理论创新策源地,在宣传思想文化领域切实发挥好引领作用。

厚植新文科建设发展沃土

新文科建设是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其本质在于构建贯通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学科体系,是落实“第二个结合”的重要实践载体。

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传统文史哲学科在知识范式、研究方法和教育体系方面呈现出结构性张力:前者侧重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系统建构,后者偏重传统学术范式的赓续传承;前者强调问题导向的实践品格,后者注重义理考据的学术传统。破解这种学科张力的关键,在于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通过新文科建设推动学科体系的重构与融合,构建既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又深植中华文化基因的学术共同体。这要求我们超越简单的学科交叉概念,推动既能运用唯物史观阐释传统文化价值,又能以中华文明精神标识激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

构建需求牵引、问题导向的动态调整机制。面对百年变局下文明形态竞争的新态势,必须立足国家战略需求,优化学科结构布局。在基础学科领域,强化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化能力,比如构建儒学与政治学、古典文献学与数字人文的交叉研究范式;在应用学科领域,聚焦治国理政重大命题,推动传统治理智慧与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对话创新。这种转型需要突破“专业培养”的传统窠臼,构建“大文科”“极交叉”的教育生态系统,通过学分互认、多导师制、项目制学习等机制创新,培育既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工具,又深谙中华文明发展规律,同时还精通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复合型人才。

高校要依托新文科建设,重点培养三类人才队伍。一是哲学社会科学理论骨干的培养。建立长周期、“极交叉”、本硕博贯通的培养机制,打破专业学科壁垒,培养具有多领域知识素养的哲学社会科学

理论骨干,以扎实的学术功力和深邃的卓识远见,立足中国的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二是新时代学术领军人物的锻造。创新“政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通过政策咨询与智库研究领域的课题攻关,引导学者在意识形态安全、文化传承发展等关键领域开展战略研究,通过研究在价值维度上强化“两个结合”的理论自觉,在知识维度上构建“经史互参”的学术底蕴,在实践维度上培育“知行合一”的咨政能力。三是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队伍的培育。将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干部政德教育和人文素养培育模块纳入干部培训体系,形成常态化、系统化干部教育机制,邀请知名学者与资深政要共同指导,培育既通晓传统文化精髓又深谙现代治理规律的新型文化治理人才。

激发有组织科研新动能

高校作为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重要力量,应当充分发挥理论创新的策源地功能。通过系统化、组织化的学术团队建设,推动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现代性转化,构建立足中国实践、彰显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自主知识体系。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系统性挖掘与现代阐释,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经验开展学理化提炼,通过批判性知识重构,形成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

构建多学科协同创新平台,突破传统学科建制的藩篱。依托平台组建由现代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等学科的学者与人文学者、理工科学家共同构成的创新团队,建立“极交叉”研究机制。在基础研究层面,组建典籍阐释与理论创新团队,重点攻关儒家思想与社会治理的现代转化研究;在应用研究层面,成立交叉学科实验室,开展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治理技术的融合实验;在政策转化层面,建立学术研究与智库服务的联动机制,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治理文化转化为现代德治与法治结合的制度设计。通过这种立体化推进,最终形成既具有文明特质又能进行国际对话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理论支撑。

构建哲学社会科学有组织科研范式,亟须建立与之适配的学术评价体系。传统评价机制存在结构性矛盾:一是以论文、著作、项目等

标准化成果形态为载体的“形式化”评价,与人文社科研究价值的多元性存在张力;二是以期刊等级、立项机构层级为标准的“层级化”评价,与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需求产生错位;三是以成果数量累积为特征的“计量化”评价,与研究质量和社会效益形成悖论;四是以单一学科为分界的“窄视化”评价与解决跨领域复杂社会问题的研究成果难以匹配。

破解上述矛盾,需要加大力度破除“五唯”(即唯分参、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全面推进学术评价机制改革。针对基础理论研究,构建以学术原创性和思想引领性为核心的评估体系,将典籍注疏的创新阐释、理论范式的突破重构、学术流派的自主创建等纳入核心指标,建立以同行评议为主导的评价模式。对于应用对策研究,注重评价研究成果能否转化为成功落地的政策,并为构建完善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治理效能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将学术成果的大众传播效果、文化产品的受众覆盖面、理论阐释的社会接受度等纳入评价范畴,针对有组织科研的开展,建立跨学科团队攻关项目评估考核机制,重点考察传统人文学者与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协同创新成效。

增强国际学术话语主导权

推进“第二个结合”需要构建系统化的国际人文交流体系。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为引领,立足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在国际学术合作中实现价值共鸣与话语创新。

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对话平台。定期举办世界级跨文明高端论坛,邀请国际一流学者、政要、文化精英共同参与,重点围绕儒学传统中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与西方文化价值体系展开深度对话,形成中西文明比较的常态化对话机制。例如博鳌亚洲论坛、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等,致力于打造兼具学术深度与国际能见度的年度思想盛会。实施国际学者驻访计划,重点吸纳海外一流汉学家、文明比较研究专家来华开展中长期学术交流,自主培养一批具备“第二个结合”理论视野的新生代汉学家。通过田野调查、联合研究等方式,增进对中国理论的直观认知。在留学生培养方面,需要完善培养模式,扎实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同时,组织国际学生深入社区、企业开展社会

实践,使其既能研读典籍中的传统中国,又能观察现实中的当代中国。

提升国际学术话语权关键在于主动设置全球性议题。这就要求我们系统阐释中华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化路径,将“天人合一”“天下为公”等核心理念转化为国际学界可理解的分析框架。建立具有中国视角的文明评价标准,例如通过发布年度“全球文明发展报告”,构建涵盖文化传承、社会治理、生态伦理等维度的评估指标体系。在理论传播方式上,开发多语种数字平台,运用VR技术再现孔子周游列国、阳明悟道等文化场景,使国际受众获得沉浸式认知体验。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组织跨国翻译团队进行精准译介,增强国际学术共同体的理解认同。

深化文明互鉴需要拓展多层次的实践路径。在学术研究层面,设立中西社会观比较研究国际课题,组织跨国团队开展联合攻关。可聚焦“儒家礼治传统与西方契约精神”“家国同构与个人主义”等命题,通过比较研究揭示不同文明的社会治理智慧;办好诸如《国际儒学》(中英文版)、《文史哲》(国际版)等学术期刊,使其成为理论争鸣的国际阵地,既刊发中国学者对自由主义理论的批判性研究,也刊登国际学者对儒家思想的创新性阐释。在民间交流层面,推动具有文化代表性的中外城市结对开展非遗展演、社区治理经验分享等活动,使文明对话从学术殿堂延伸至市井街巷。这种立体化交流模式,既能保持理论探讨的严谨性,又能增强文明互鉴的感染力。

确保理论传播实效必须建立动态优化机制。开发有学术影响力追踪数据库,运用大数据实时监测国际期刊、学术会议对中国理论的引用与评价。通过构建理论传播区域认知图谱,精准识别欧美、东南亚、非洲等不同区域的接受差异。传播策略的调整需建立多方协作机制,既要依据数据反馈优化叙事重点,也要通过国际学术共同体中的第三方学者开展理论阐释,避免文化传播中的“话语逆差”,推动中国理论在国际学术场域实现创造性转化。

(作者系山东大学党委书记)

大学书记校长论坛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医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作为中华民族原创的医学科学体系,中医药承载着五千年的生命智慧与文化基因。在深入推进健康中国战略的新时代,推动中医药文化进校园,已成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全民健康素养的关键举措。全球化背景下,此举不仅是传统文化的传承工程,更是关乎民族健康未来的战略选择。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率高达52.7%,6—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约为19%,慢性病低龄化趋势日益凸显。系统性地将中医药文化融入国民教育,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健康教育体系,既能夯实民族文化自信根基,又能从源头上培养健康生活方式,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持久动力。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璀璨明珠,蕴含天人合一、阴阳平衡、辨证论治、治未病、整体观等深刻哲学理念,构成了独特的东方生命认知体系。中医药发展已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药文化进校园,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青少年健康素养的重要途径。

有助于青少年培养健康生活方式,树立健康观念。中医强调“上工治未病”。向中小學生普及中医健康知識,有助于启蒙其“治未病”理念,从小建立“未病先防”的意识。让学生了解食物寒、热、温、凉的性味,认识“怒伤肝、喜伤心”等“七情”对身体的影响,掌握“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等顺应时令的养生知识,能帮助学生理解合理膳食、情志调摄及顺应自然节律的重要性,养成健康生活习惯。中医的“整体观”和“天人合一”理念,能引导学生理解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身心互相影响,并与外界环境息息相关的道理,认识到保持身心和谐、与环境和谐的重要性。同时,掌握简单实用的中医药保健技能,学会从整体角度看待健康问题,对中小學生成长意义深远。

有助于青少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与认同。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蕴含着深厚的哲学思想、伦理道德、历史知识和民俗智慧。许多传统节日习俗,如端午节挂艾草菖蒲、喝雄黄酒,冬至吃饺子等,都体现了中医防病养生的智慧。中医“大医精诚”“医者仁心”“生命至贵”的精神,能让学生学会尊重生命、珍惜生命,形成对生命的责任感。了解中医药历史上的辉煌成就,如《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著作,孙思邈、李时珍、屠呦呦等人物及其在全球健康领域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能让学生直观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实用性和先进性。学习中医药文化,既有助于学生理解传统习俗背后的科学内涵和人文关怀,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又能有效激发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

有助于青少年提升科学素养与思辨能力,拓展知识视野。学习辨识常见中草药、体验简单的穴位按摩、观察舌苔等实践活动,能够锻炼学生的观察力、感知力和动手能力。中医的辨证论治、取象比类等方法论,有助于开阔学生视野,培养整体性、多元化的思维方式,理解世界和生命现象的复杂性。引导学生思考中医理论(如阴阳五行、经络学说)与现代科学(如系统生物学、神经网络)可能的联系,能有效激发学生的科学探索兴趣,打破学科壁垒,提高思辨能力和创新能力。同时,中医九种体质因人而异的调理理念,能让学生理解“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从而更清晰地认识自我,减少成长中的迷茫。

面向未来,“中医药文化进校园”仍需相关部门以及政策的大力支持,不断完善体系建设和长效机制,可着

推动中医药文化进校园

□ 徐安龙



重在以下方面持续发力:一是完善课程体系与教材建设。开发分龄分层教材,小学阶段侧重趣味认知与穴位按摩体验;初中阶段增加基础理论学习与情志调摄内容;高中阶段深化对辨证论治与疾病预防的理解。二是强化师资队伍建设。依托中医药高校建立教师培训基地,实施“双师型”教师认证制度。通过定向培养、专项培训、中医师资格认证等方式,打造一支“懂中医、爱中医”的师资队伍。三是创新教育形式与载体。开发AI驱动的沉浸式、个性化学习系统,通过加强交互性问答和操作提升学习兴趣与成就感,利用AI分析学习数据,优化教学内容与策略。建立中医药教学资源库,构建网络传播矩阵,利用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在线社区等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营造良好的分享交流氛围。四是深化校地协同合作。推广“高校+中小学+医疗机构”协同模式,合作开展“中医名家进校园”活动,定期为学生提供健康讲座和义诊服务。五是加强评估督导与效果追踪。建立中医药文化教育质量监测体系,开发中小學生“健康护照”成长档案,将学生健康素养提升情况纳入学校考核指标体系。

中医药文化进校园,是关于生命观、健康观、文化观和世界观的启蒙浸润,也是守护文化根脉的战略举措,更是培育健康新人的时代命题。中医药文化不仅守护青少年当下的身心健康,更赋予他们理解传统、面向未来的智慧与力量。通过文化筑基和健康赋能,能够让中医药在新时代校园中焕发新机,推动中医药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使其真正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健康密码”。

(作者系中山大学香港高等研究院院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原校长)



君子何以『慎言』

□ 戴和圣

慎,有谨慎、小心之意,引申义则有忧虑、忧惧、务必、千万等。“慎”是一种心理状态,反映在人伦日常中,就是一种生活态度。当下,人们的话语行为受到高度网络化的影响,无论是时间、空间、方式,还是环境,都有了颠覆性的变化。人们在言行获得更多元、快捷的同时,也面临诸多困扰和压力,在我们的身边因为言论不

慎造成负面影响,乃至引起道德、伦理、法纪问题的现象屡见不鲜。由此,生活中的慎言很值得我们深思。

慎言的传统由来已久,孔子就极为推崇,《论语》中“敏于事而慎于言”“慎言其余”之语颇多。古训说“祸从口出”,诚如张载所言,“凡一言动,是非不可随之而生,所以要慎言动。‘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不越求是而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人格修养、立德修身,进而把“慎言”与安身立命相关联,久而久之形成贤能之人的生活哲学。

言有据。墨子称言必有三表,即“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说话要有历史根据,要有现实经验,要经过实践的检验。生活中的信口雌黄、无端臆测、人云亦云百害而无一利,这样的例子和教训比比皆是。孔子曾一针见血地谴责,“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整天聚集在一起,说话不合乎道义,不顾及大道理,喜欢卖弄小聪明,这样的人难有什么成就。诚然,在现实生活交往中,有根有据的讲话才能具备沟通的力量。

不安言。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谈论他人是非,随意对人评头论足,向来为智者所不

齿,孟子就说:“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王梵志所论更为鞭辟入里,“莫言己之是,勿说他人非。道是失其是,道非得其非。白圭之玷尚可磨,斯言之玷不可为”。尤为不可取的是,在揭别人的短处时,炫耀自己的长处,因而提倡“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这告诉我们,“耳不闻人之非,目不视人之短,口不言人之过”,不探听别人的是非过错,不盯着别人的长短,不讨论别人的功过得失,与人际交往理应坦诚相见,宜当面批评、背后揭短,宜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忌以己之长较别人之短。

戒多言。王羲之七子王献之小时候和两个哥哥一同拜会谢安,之后人们向谢安问起兄弟三人谁最贤,谢安回道“小者佳”,问及缘故,解释道“古人之辞寡,以其少言,故知之”。小者说的就是王献之,在和谢安的交谈中多以寡喧为主,其兄长则话语甚多,可见谢安视“少言”为好的品行。在中国人心中,恰当的寡言是一种修养,“多言不如寡言,寡言不如不言;和缓而言,则有条理,而人不厌”。戒多言,本质上是说话有“度”的艺术,“言多必失”,就像冯梦龙说的:“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故我们当谨记

“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

言必信。“言必信,行必果”,言出必行,言见于行即是信。“信,诚也”,向来被定义为一种高尚人格;反之,则被视为小人而备受人们鄙弃,“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孔子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墨子也说“言不信者行不果”。当然,言而有信的“言”,其重点在于“义”,有理有据,而非妄言多言,但特殊环境下的“权变之术”则另当别论。此外,慎言并不意味着不言,因为担心言多语失,索性“不过问、不表态、不拍板”的做法,则背离了慎言的初心。

“言必有物,而口无择言;行必有恒,而身无择行。”无论工作、生活还是交往,说话要严谨有据、掷地有声,做到言出必行、持之以恒。要把握好“三说三不说”原则:说好职责领域的话,不了解的不说;说好学有专长的话,不熟悉的不说;说好经过证实的话,不确定的不说。如此,慎言才是一种好的境界。

